

董子竹◎著

王阳明

传习录再传习

《传习录》逐条新解 阳明学功过再探


佛学大家释心学
知行合一致良知

长江出版传媒
崇文书局

董子竹 著

王阳明

传习录 再传习

 长江出版传媒

崇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阳明传习录再传习 / 董子竹著.

—武汉: 崇文书局, 2019.1

ISBN 978-7-5403-5257-8

I. ①王…

II. ①董…

III. ①心学—中国—明代 ②《传习录》—研究

IV. ①B24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8492 号

王阳明传习录再传习

责任编辑 吴海明 梅文辉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传媒 | 崇文书局

地 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C 座 11 层

电 话 (027)87393855 邮政编码 430070

印 刷 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27.25

字 数 435 千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8.00 元

(读者服务电话: 027-87679738)

本作品之出版权 (含电子版)、发行权、改编权、翻译权等著作权以及本作品装帧设计的著作权均受我国著作权法及有关国际版权公约保护。任何非经我社许可的仿制、改编、转载、印刷、销售、传播之行为, 我社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目 录

导语	1
----	---

卷上

徐爰录 (1—14)	29
陆澄录 (15—94)	70
薛侃录 (95—129)	167

卷中

答顾东桥书 (130—143)	219
答周道通书 (144—150)	252
答陆原静书 (151—154)	266
又 (155—167)	271
答欧阳崇一 (168—171)	286
答罗整庵少宰书 (172—177)	294
答聂文蔚 (178—184)	304
答聂文蔚二 (185—194)	314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195)	330
教约 (196—200)	332

卷下

陈九川录 (201—221)	337
黄直录 (222—236)	350
黄修易录 (237—247)	359
黄省曾录 (248—315)	366
黄以方录 (316—342)	409
结语	427

导语

—

学过《孟子》的人都应该知道，一部《孟子》已经导致中国历代歧义纷陈，而“阳明学”更是如此。阳明在世时，不同意见都已经是风起云涌了。到阳明去世后，自标阳明嫡传、正传何止千百？原因何在？非常简单，“阳明学”虽然是明确了孔孟宗旨，即养心以尊天。但当人们说不清何为“天”时，也就说不清何为“心”，只能各说各话了。

现在北京有一所书院名“三智书院”，所谓三智者，释道儒也。自唐以来就有三教合一的说法，在今天时势下，能三教共弘，当然是件伟大的事。当成为纠正 14 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功利主义、丛林文化甚嚣尘上的一个强力冲击。

倒不是说自十四世纪以来的文化，已经到了覆灭人类的程度。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个文化还在自己的上升期，远未到逆而返或覆灭人类的地步。好坏由它吧。这个文化的威胁和残害，对人类现在已经是暴露无遗了。

正因如此，才有像“三智书院”这样的机构成立，才有全国性恢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波涛汹涌的呼声，才有“四个自信”的伟大号召，才有中国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民族振兴梦。所以，中国的崛起很可能坎坷重重，但是不如此，人类最后一点慧根，最后一点希望就会很快彻底覆灭。

儒家传到宋儒形成的“理气两分”观念，实际上是西方 14 世纪所谓“人性解放”的先声。宋儒所谓的“形而上之为理，形而下之为器”，作为当时文化大堕落的萌芽，那时便在中国土地上悄悄滋生了。

人们回忆一下，自程朱理学兴盛后，中国自己的衰败是很明显的，所谓的

汉唐气象早已荡然无存，当时的中国风格、中国气象与大唐前几乎是天壤之别。三百年后明儒续宋儒进一步张扬，如果看透了，你会发现宋明理学最骨子里的东西与西方 14 世纪人文主义几乎同出一辙。也就是说，宋元末、明始初西方的人文主义在中国才兴盛起来。不信的话，可以看看明以后的中国文学史。

人们仔细品味一下，宋的建立正是佛法所谓的“末法时代”的到来。从唐末开始的“辟佛”大张旗鼓地放任起来，中国宋儒配合封建帝王的辟佛、灭佛在理论上作了遥相呼应。宋明儒理论上的“理气两分”的观念与后来 14 世纪的西方人文主义、18 世纪的西方启蒙主义，乃何其相似尔。

“形而上为之理”与康德、黑格尔哲学简直是同出一脉。今天被人类称为所谓的“普世价值”的人的“主体性”精神，不就是康德哲学的核心吗？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不就是朱熹的“穷理尽性”吗？难怪冯友兰能把中国的“道”解释为黑格尔的“总规律”。

至于所谓的“形而下为之器”，到了朱熹这里，就是他解释的“格物致知”。这大大歪曲了《大学》中“格物致知”的原意，简直是开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先河。民国初年，中国所有学校讲自然科学的教科书不是统称《格物》吗？

人们还记得王阳明“格竹”的故事吗？可惜那时的王阳明缺了自然科学的手段。如果当年王阳明了解今天的自然科学手段，他就会成为中国第一个“竹”专家、“竹”院士了。自然科学、逻辑思维理性相加、相交、相辅，不就是今日世界文明的主轴吗？

我们真该为宋明理学可惜，如果中国皇帝们真懂了宋明理学的根本思路，再大开海禁，像西班牙、葡萄牙、英帝国一样，大力提倡海盗掠夺，把海盗封王、封爵……中国早成世界霸主了。明朝永乐后的皇帝，没有一个成器的，否则说不定那时中国就可以早早成为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了，哪轮得上欧美人称霸世界。

但是，自所谓的人文主义、启蒙主义这些美妙的文化思潮成为世界文明的主潮之后，这世界可有一日太平？一个大地球简直成为了一个野兽的丛林世界。一、二次世界大战令罗马人东征、奥斯曼帝国扩张、蒙古驰骋欧亚大陆相形见绌，不值一提。时至今日，我们这个世界还是难民过亿。

人类兽性的嚣张跋扈，在今天世界只见其升，未见其落。多亏一个恐怖平衡，令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国家能有五六十年之祥和。须知，在我们暂时的祥和之中，全人类难民已经过亿了。

我们今天提王阳明、赞王阳明，不是说王阳明就能拯救这个杀戮遍野的世界，而是说王阳明的真正儒家学说在人类进入末法时代，虽然也随世论“辟佛”，实际上是中国固有文明对人性大堕落前的最后一次抵抗、挣扎、拼搏，其精神之伟大永远值得后人敬佩。

我们不幻想人类社会能自己跳出这个“五浊恶世”，但终要为生命的大解脱留下最后一点希望。这个希望只能是存于中华民族的血脉里。

元朝静斋学士刘谧有论：“儒疗皮肤，道疗血脉，佛疗骨髓。诚知皮肤也血脉也骨髓也，不容有一之不疗也。”

这个历史在中国三千年，拯救世界的历史重任不能不再一次落到中国人身上。今天我们高扬王阳明，并不是说阳明一出世界光明，而是这个世界病人膏肓，只能从治疗皮肤入手了。

二

“良知”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凡人尤其是年龄大一点，从事某个具体专业的，比如画家、诗人、科学家、雕刻工、首饰工……都会有体会，《庄子》中也举了无数的例子。

这些例子用《孟子》的话全部可以概括：“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这个道理在《中庸》中有更详尽的说法，而且更深刻。“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才是儒家真正的“良知”。所谓的“赞天地之化育”，就是《庄子》与天地精神独往来。

《中庸》这段话大旨是正确的，只是还欠准确。例如，“天地”二字问题就很大。首先，是模糊的，远没有《老子》“无，名为天地之始”清晰、明了、准确。

现在不纠缠这个问题了，太复杂了。没有对《楞严经》《老子》《论语》下

过死功夫的人，是很难明白“天地”二字的模糊性所造成的麻烦。首先，这“天地”二字指的是什么？是六识之内的时空吗？如果是，《中庸》这整段文字就大有问题。你参了半天的化育，就只是人在六识牢笼中的化育。如果是这样，宋儒的“理气两分”就有道理了，“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就可以成立了。因为六识之中的“人”“知”“物”必须固化为形象才可以认识，那形而下之为器，是可以成立了，可惜那王阳明的“致良知”就错误了。以此类推，如果朱熹所谓的“格物致知”可以成立，那今天的自然科学就真是真理的宙斯了。因为自然科学就是要把无尽无休的“格物致知”所积累的“知”变成“知识”。在当代许多哲学家心中，这些“知识”高度积累后，抽象出来的形而上之“道”就是“天地”的总规律（冯友兰语）。

如此偷梁换柱，中华文化的根基就荡然无存了。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就只能是当代所谓的自然科学文明的“附庸”了。即使是其中偶得“良知”，也只是自然科学逻辑思维论证中的一个个小补丁。

新儒家正是利用了我国固有文化的这个“漏洞”，使中国文化拜倒在今天所谓的“人类普世价值”的足下，实际上是又为人类立起了一个新文明的“神”。那么有了这个“神”，人就再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而真正地成为了神秘“天地运动”的参谋，成了被主宰者。程朱胜利了，熊十力、牟宗三、杜维明胜利了，康德胜利了，黑格尔胜利了，大家虔信基督的拯救吧。

如果真是这样，今天，我们再不要提王阳明了，不如光提稻盛和夫的日本“良知”学。人家的“致良知”有多么明确的实效啊，明治维新正是利用了阳明学的成效改变了一个日本，从此日本富国强兵的。

到了这里，我们还提什么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没有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就荡然无存。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人类所谓的天地是“实”还是“虚”？是不是有一个真正的“形而上为之道”“形而下为之器”之分？如果依我们认得的肉体感官来认定，那么整个西方文化尤其是它的逻辑体系就是正确的。如果不是这样，“天地”与“人心”本不可分，天地动，人心动；人心动，天地动。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问题不解决，王阳明的良知学的价值就无法

认定。

事实上,《中庸》的“天地”二字是个统称、代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中国人的“天地”概念,实际上是一个不可言表的模糊指称。这一类的概括在《老子》《庄子》《周易》《论语》都有清楚的表达。

例如,老子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玄牝,就是生命的“知”,凡“知”皆能所一如,离能知无被知,离被知无能知。谷神永远在“知”,这个知才是“天地”(时空)的根,这个“知”绵绵不断,似存若无,恍恍惚惚。

可见,“天地”这个词在古代只是“知”的过程、背景。有什么样的“知”就有什么样的“天地”。和我们今人所谓的“固化时空”根本不是一个意思。如果“知”是如此流动绵绵,用之不见,恍恍惚惚,惚惚恍恍,那朱熹如何在这梦幻般的世界“穷理尽性”“格物致知”?与朱熹同源的西方逻辑思维理性、自然科学不就是梦中说梦两重虚吗?

生命之“知”是永恒的也是无常的,我们日常生活中见到的“常”,包括“常积累的知识”,只是天道变化中的一个几乎微不足道的假象。

宇宙生命系统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自我觉悟,也令宇宙系统中一切生命觉悟。正是这个觉悟同时改变了“天地”,这实际上是因果互相酬的漫长过程。所谓的佛、圣人,就是紧随宇宙生命这个觉悟过程,促进这个觉悟,圆满这个觉悟的。这个过程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有时看来曲折婉转,坎坷艰辛,甚至灾难重重,但其实都是宇宙生命觉悟的本有的题中之义。不必大惊小怪,惊慌失措。

这个大觉悟的全过程,最终的结局就是佛家《佛说无量寿经》的全部、全局。当然,现在仍然生活在六识硬壳中的人,想完全理解这个无结局的结局实在是太困难了。但是绝对不可能是一无所知,那西方极乐就是虚无缥缈的另一个世界了。也就是现在一些诬蔑净土的人所谓的“死”世界。事实上是极乐不离娑婆,娑婆也不离极乐,都完完整整地体现在每个生命的实践中、觉悟中。我们的人心,实践着觉悟着就是极乐世界的一部分。

所谓的一个世界两个世界、形而上形而下的争论,人的世界、神的世界的分别争论,是人类分别心的无聊。

正如我们开篇说的，在人类社会，随时随地都有西方极乐微露的光芒，只是人局限于人相、我相，意、必、固、我的六识障碍，相逢不相识，面对也茫然。即便偶有所识，还以为是自己的聪明、努力、运气好，根本不知是西方极乐整体大光明的微露偶现。

诗人因灵感而自视天才，匠人因匠心独运而傲慢无比，科学家因独特发现沾沾自喜，政治家因一时强大雄霸，自视皇权天授……都是自不量力的表现，各自走向自己的反面就是理所当然。

若说第二类就包括我们说的所谓自觉的“致良知”，致良知者的智慧对宇宙生命运动有一定的觉悟。如《孟子》最后提到的尧、舜、禹、汤文、周公、孔子，都看到宇宙生命系统的大文明大觉悟的必然，皆是天之历数在尔躬，对于这一切正如孟子概括的“有的是见而知知，有的是闻而知知”。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国的古代圣贤也只算是开了人类真正认识自我天地的统一存在的先河。从此使中华文明的觉悟火种一直得以保存，为净土往生彻彻底底的生命解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事实上，生命从来不存在形而上形而下之分，全都是社会生活中一切现象。自觉的，不自觉的，天生的，后闻的，可以用释迦牟尼佛一句话概括：“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性，只因颠倒妄想而不能证得，一旦证得，自然智，无师智，一切智当下现前。”这些现象的存在就说明娑婆本不离极乐，极乐也本不离娑婆。但终究归于极乐。

在这个翻天覆地的过程中，人心的发展过程既是实践的、又是理性的，但这并不说明二者是可以分成两个的。这样各种歧见的出现也不足为怪了。如果宇宙生命系统这样复杂的大解脱，一直是直线前进，“是”仅仅是“是”，“非”仅仅是“非”，反而成了怪事，反而反映不出宇宙生命的多姿多彩，丰富生动。

比如说，王阳明的致良知，比自然科学体系更符合宇宙生命的本来面目。但致良知本身不是没有先天的缺陷，相对来说，对于致良知，自然科学也未必不是一种宇宙生命大觉悟的空前助力。

三

儒家后世之所以偏颇，甚至是走上了新儒家这样的邪路，原因看来是个人见解的不同，其实不然。

从表面上看，王阳明的心学对宋儒的偏颇有所纠正，这个纠正的关键是回归了心灵的实践理性。在王阳明看来，许多理论界限是要有一个基本的厘清，但重要的不在此处，而是要在具体的实践中体验心灵“良知”的真实存在。

生命本身的运动无形无相、无时无空，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永远光明。是不可能用意识的逻辑思维表述清楚的。这对于现代适应了逻辑思维理性的人类来讲，只能以“神秘主义”命名之。

不管如何神秘，中国文化，尤其是它的“致良知”在生命实践中实效是非常明显的。但这些实效明显不能用意识推论道理。不要说靠早期的线性逻辑思维推导不出来，就是辩证思维、系统思维也分析不出获得良知的来龙去脉的道理。所以一些基本搞懂了“致良知”的汉学家就命名为直觉思维，有的甚至是称为“神秘直觉”。

不要说外国人，就连外国人的汉学家也搞不懂“致良知”的来龙去脉。更明白点说就是儒家学说的直接传人，甚至是开创人，如周文王、周公、孔子对于“致良知”的原理也若明若暗。

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致良知”起源于祭祀。周文王的《周易》后来之所以有象数派、义理派之分，实际上是对“致良知”来源有分析的两大派系。

举例来说，武王伐纣，各地诸侯已经齐聚孟津，正准备起兵之时，有白鱼跃上武王龙舟，武王起卦，不吉，便罢兵。第二年再一次用兵，果然牧野之战，殷商之兵不战自溃，不仅不迎敌，反而自相残杀，血流成河。

儒家的“致良知”就是这样起源的，其理论总结就是《周易》。具体的《周易》理论，留待未来叙述。

原始祭祀发展到孔子，是中华文明的一大进步，孔子把原始的乞心外神的祭祀发展为自我“心祭”，既尊重原始祭祀，但更强调个人的“用心”的独立性。孔子提倡“内省不疚”实际上是来源于《大学》的精华，《论语》就是对《五经》的全面总结和整理，除其糟粕，取其精华。后世孔子弟子真正理解孔子的并不

多，所谓的儒分八脉，事实上还是学表的多，学实的少。孔子学说中好学的实际上是《礼记》。《礼记》的精华在《大学》《中庸》，但《大学》《中庸》太难掌握了。

如果你研究《孟子》，其所言者，引导学生实践的大半是《礼记》的内容，好讲也好接受。但孟子不是不知道他讲的内容莫过是为“敬天尽性事天”做日常的修养准备。所以他强调一个“养”，“养吾浩然正气”。这和孔子的“心祭”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目的都是敬天、养心、尊天、事天，即与天同调、同步，事实上就是王阳明的“致良知”的前期准备工作。“知”是生命的普遍性，在儒家看来只有“知”之“良”者才能是与天同调、同步，所以无往而不胜。

事实上，孔子的《论语》是知道儒家的“致良知”在生命的道理上是不透彻的。比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也知天运行的“知”如瀑布流淌，想在一刹真正抓住是办不到的。

他还知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说任何人的“知”只是沧海一粟，而整个沧海是不可骤知的，也就是说要承认任何“知”都是不完整的，只是整个六合网络的一个节点，而“六合之外（只能）存而不论”。

再者任何“知”都只能知“被知”，“能知”本身是不可知的。凡“知”对“能知”只能悟。他更提出了“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重要命题。这就快和佛家对生命之“知”的透彻认识接上头了。

可惜孔子的后人对这些伟大的提示，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孟子》中有把上述孔子理论化为其“养心”的实际内容的，但孟子过分的人世精神，把孔子许多精辟的生命论述落到治国理政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中，反而失去了孔子的真面目。

中国儒家的变质大致起自唐中末的韩愈，此人狂妄自大，野心勃勃，以孟子后第一人自称。其实，你不必多读他的其他文章，就是一部《谏迎佛骨论》，论据之牵强狭隘，历历在目。什么“华夷之辨”“朽骨不立”之类，实在有辱所谓“八大家”之首的名号。

除了儒家文化人的堕落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一直提到的人之成人之

后，被锁在六识牢笼中其认知局限性的悲哀。人者，生命本体大光明的幻化，大光明本有觉悟的本性。这个本性到了被锁在六识牢笼中的人类来说，反而成为了一种自作聪明的游戏。这样，人类思维模式就固化为了所谓的依据“事实”形成的概念、推理、综合、演绎，最后形成理论体系。

一般人认为这样的思维方式是 14 世纪后西方独有的，19 世纪中叶才传入中国。其实，你去读张横渠、周敦颐的著作，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要素系统化、条理化，实际上是体系化，尤其是“形而上，形而下”的认知分野。人们再仔细品味朱熹体系的味，已经有了物我两分、人天两分的味道了。诸位若是不信，请读朱熹解屈原的《天问》，一部诗意盎然、宏大潇洒的优秀诗作，到了朱熹手中成了干巴巴的天象教材了。

最后，孔子出神入化的“心祭”，孟子煞费苦心的“养心”之法，全部成了儒家后人练心修心的教条了。最大的笑话就是王阳明遵朱熹之教的“格竹”。什么“知”也没有致来，弄得差点成为神经病。

所谓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也莫过是得了禅宗的一点表皮。从整个《传习录》来看，我们会发现，王阳明确实是纠正了张周程朱的近似神圣道德论的荒唐，张扬了生命自身的实践理性，接上了孔孟的灵气，但并没有真正地悟透生命的本来，其对弟子的教诲，明显没有出《周易》《大学》《中庸》的框架。所谓的“龙场悟道”，较之真正的禅悟最少差三千里，也就是远未到“五蕴皆空”的水平。

儒家的“致良知”本自《礼记》。《礼记》者祭祀中仪轨，有行为的规范，也有用心的规范。历代天子诸侯几乎无事不祭，后经孔子整理，作为授儒生的教材，待儒生结业后，作为奉天子、诸侯、大夫家祭祀，尚达天庭仪轨的准则，经孔子选择编辑成书，是其授三千弟子的教材，与《尚书》共承一体，构成祭祀的主要内容。《周易》则是祭祀择日观效的验书，《诗经》则主要是祭祀中的唱颂之词。这一切祭祀的功利目的，是非常明显而强烈的。

事物一旦落于六识中的功利，其所谓的“良知”无论如何脱不出六识牢笼的限制。即使是真“良知”，与生命本体的大光明也绝对有隔，因为生命本体本无功利可言，如有功利也只是一个促众生觉悟。但是，从我们见到的“致良知”成

功者，有几个人是纯为生命的大觉悟而“致良知”？如果有，王阳明就不会终身“辟佛”了。

鉴于以上原因，儒家后期想不偏也不行。

四

“知”“良知”“致良知”这是三个不同的概念。

“知”是生命本体的大光明，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永恒照耀。“知”只是生命本体自我觉悟的一个必然表现形式。通过随众生缘映照的“幻影”证明自己的存在。正因为它随众生缘而“照”、而“觉悟”，所以是不可能有任何错误的。而且也是永恒不止的。

但是，这个“知”一旦转化为众生的“生”，众生事先并不明白自己的“知”来源于生命本体的大光明，只见光明映照出来的“幻影”，即所谓的“相”。这种情况在佛家就叫“无明”。众生在“无明”中只能依被遮过的“想”而“行”。在这个“行”中，生命本体的大光明被遮上了一层纱，这层纱就是佛家《十二缘起》中的“识”。佛家说“一切唯心，万法为识”，我们人类见到的这个世界万物包括肉体自我，就是“知”透“识”固化了的幻影。

“识”有两个特点。第一，要固化在具体的肉体感官上。这一固化造成了两个巨大错觉，就是“人”“我”二相的出现。本无主体的“知”，变成了有主体的“识”。与此同时，“识”又被肉体器官的物理功能所限制，眼有眼识，耳有耳识……这样，本无障碍的生命本体之“知”就通过“识”转化为色、声、香、味、触、法。这实际上是生命本体“知”的退化。就是这一退化，“知”变“识”，加上固化在一个肉体上，“爱”和“取”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众生短见的“无明”导致这个所谓的人世间的成立。

从生命本体之“知”转化为人的“知”的生存状态，中国古代经典讲得最清楚的就是《老子》的第一章与第二章。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这就是老子“观自在”的结论。这个“观自在”无内无外、无物无人、玄而

不玄。实是鼓励人们打开自己的“心”门，也就是“观自在”。它不同于《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心经》是观到生命本体，老子的“观自在”是观的“道”与“人”的演变关系，但结论与佛家“十二缘起”是一致的。前者认为人类一切灾难的根源是由“无知”引起的“爱”与“取”，由此产生“生、老、病、死、苦”。老子则认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原因都是说，生命本体大光明的映照只是让你明心见性觉悟，谁让你自作聪明，分别爱、恶、舍、取？这不是明显对天道厚此薄彼吗？大光明本无分别，你却非要分别，你不遭天谴，谁遭天谴呢？其实，天从不谴人，天从不灭生。只是你逆天之行，天不怨也怨了。

所谓的天谴、天惩，就是由于你和天的“知”不能同步同向。例如，说天无时空，老子言“无，天地之始”，这和尧谈的“天禄永终，四海困穷”本是一个意思。

老子是说“知”展开了，你要分别而未分别之时，也即可称无分别时，生命的大光明就首先到来了。“知”先于“天地”而开始，所以，“无，名天地之始也”。当你有了分别有了认知，幻影之想就真正地成相了。所以，“有，名万物之母”。当你明白生命之“知”的这个运动真相时，简言之，在中国儒道释这里就叫“明心见性”。一旦从这个角度你认得生命本来面目，你只会惊讶天地万物形成的无比奥妙。而当你这一切有了聚焦，有了个人的爱、憎、美、丑的判断，并欲有所“取”时，你的眼光就立即有了局限性，即“常有，欲以观其微”。

不管是你观其“妙”，还是贪其“取”。能观之心此时与被观之物，永远是一个统一的“知”，只是这个知表现在你的六识之中时，分别成为眼、耳、鼻、舌、身、意的判断时，成为了色、声、香、味、触、法时，你以为你明白了，清楚了，天地人原来是这样啊。你不知当这个大幕揭开时你已经犯了大错，那就是你把本不可分的“知”错认为一个是“能”，一个是“所”，是两个东西。“知”的双方在上述时空本来绝对一体，现在被你各分成各了。

尤其是你的眼耳系统具有相对的物理同一性，经久不变，“天禄”“四海”就成为了你感知中永久不变的东西。其实，一个“知”就是一个“天禄”，一个“知”就是一个“四海”。根本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天禄”“四海”。

“知”变，一切变，无人，无我，无时，无空，无物，只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生命大光明。这一切就是“知”的生命本来面目，也是“生”“灵”“性”“明德”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良知”“良能”。如果无六识之遮，无人、无我对虚幻之相的“取”，说什么“良知”“良能”？但全部“知”都是“良知”“良能”。

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性，只因颠倒妄想，不能证得。一旦证得无师智，自然智，一切智当下现前。”

上文我们讲解了儒家“五经”的作用，就是古祭祀的操作手册。从这些文化遗迹通盘思考，古代人的祭祀是非常隆重、讲究庄严的活动，实际上是一场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庄严的审美活动。在这样的活动中，六识被强制屏蔽了，人我之相在“天”的威严下，也暂时收敛了，如是就有“良知”“良能”的显现。这对于与生俱来生活在颠倒妄想中的人类就是“良”的奇迹了，所以有“良知”之称。

庄子说：“官知止而神欲行”。说到底就是屏蔽六识的干扰所自来之知，即大光明本体之“知”。这就是必然中的“良知”。凡在具体的实践中不思不虑，不受六识干扰，就必有“良知”到来。

估计这个发现是非常古老的，所谓的《五经》实际上是其精华的总结。在古老的中国，这样的实践经验应该非常漫长而持久，周文王《周易》应该说是做了第一次理性总结，其子又将这样的文化引入政治体系，最后在孔子的手中集了大成。“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把这样的心祭用心，发展为系统的“心祭”之学，事实上是已经快摸着真正“知”的神圣奥妙之边了，从而开创了中国人独特的先进文化——儒学。

实际上是从周公就已经开始，由孔子集大成，为了实现人的“致良知”而创造了一套系统的“养心”文化。《论语》《孟子》就是要求人们在生活实践的一言一行中，克服六识的“梦想颠倒”。也就是孔子教颜回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即永远生活在祭祀心态中，这就是儒家所谓的“致良知”的“致”。

在儒家看来，不要去有意识追求“良知”。只要你时时事事“致”，不令六识的“颠倒梦想”抬头，行为中不抬头，意识中也不抬头，连下意识中也见微